**history/历史(Lì Shǐ)**

|  |  |  |
| --- | --- | --- |
| European Perspective | François Hartog | 27 May 2022 |

为了描绘出一个比较的框架，我将把这个简短的陈述集中在我称之为历史和历史书写问题上的最初选择。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有诸多开端的国家。希罗多德不是被称为"历史之父"吗？即使我们都知道，历史及其书写并非肇自希腊，而是在更远的东方，而且要早得多[[1]](#footnote-1)。

在连续性是如此重要的古埃及，王室名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末。埃及人自那时就开始在木板和象牙板上刻画象形文字；后来，他们在纸莎草纸上的汇编，成为了第一批年谱的起源。年谱记录了国王的重要事迹（或至少记录了当时所认为的重要事迹）。但是，埃及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也许是它的原地性（autochtony）（用希腊的概念而言）。就他们对过去的回顾而言，埃及人除了自己和众神之外，眼中看不到其他任何人。而且，众所周知，他们的纪念碑有一些独特之处：他们并非对过去感兴趣，而是表现出对永恒的渴望，这种永恒是物质的或石化的，这与希腊史诗及其对 "不朽的荣耀 "的赞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2]](#footnote-2)。

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三千年末之时，阿卡德君主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在其权力之下，并招募文士来书写历史的人，进而合法化其权力。这种历史编撰学是一种皇家历史（唯有国王方能创造历史），是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特别是通过庞大的铭刻使自己具现化），是一种排他性的历史（掌握在作为知识分子的种姓阶层、书写控制者的手中）[[3]](#footnote-3)。

对（希腊的）东边来说，古代希伯来人的那些圣典，也总从根本上被认作为历史。然而，尽管《圣经》中一直栖居着有关回忆的渴求，但它从未对过去表现出任何好奇。内中主要强调的危险是忘却祖先的经历，不再相信他们的真理。 以色列 "接受了成为祭司王朝和神圣国家的律令：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它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之国[[4]](#footnote-4)"。

那么，我们该给希腊人怎样一个定位呢？ 这些从未被启示录垂青过的人，他们不知晓纪念的必要性与责任。他们住在东方国家边界附近的狭窄定居点里，难道他们不是试图把自己伪装成"先来者"的"后来者"？必须指出的是，他们自己从未声称自己是历史编撰学的初来者。希罗多德本人，从未宣称自己是历史的第一个发明者。

他们的确是后来者。因为他们只是在最近（公元前八世纪）才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文字，采用了叙利亚-腓尼基（Syro-Phenician）字母。他们还需要三世纪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撰写他们的第一部历史。但希腊世界既不知道文本是一种启示，也不知道书写是作为专家种姓阶层的专利（直到迈锡尼王国仍是如此）。

在认识论上，希腊人总将看（而非听）当作知识模式的特权。去看，也就是自己去看和去知悉，是同一件事。 在本体论上，他们在世界中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对希腊人来说，在场、在那里、去看和去知悉都是共在的[[5]](#footnote-5)。

占卜与历史

让我们将目光暂时回溯到第二千年末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即纪念碑和皇家历史编撰学的第一种模式，其方法既简单又无可争议，我想简要地谈谈这种，似乎是将占卜和历史联系起来的交互。在那里，占卜对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占卜者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积累、分类神谕、制作清单、汇编案例并创建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6]](#footnote-6)。占卜者以穷尽为理想作为指导（收集所有的案例），他一直在寻找先例。他的工作方式可与法官的工作方式相媲美。换句话说，占卜，在成为一门关于未来的科学之前，首先是一门关于过去的科学。

在马里（Mari)（叙利亚的一座大宫殿），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可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第二千年初的神谕，现代研究者将其称为"历史神谕"。为何是历史性的？因为神谕并没有采用权威的方式——"如果动物（被献祭的羊）的肝脏是这样的，这预示着国王将以这样的方式（在未来）占领该城镇。"——而是说 "如果动物的肝脏是这样的，这标志着国王已经以这样的方式（非常精准）占领了该城镇。" 这种从未来时态到完成时态的说法，确实令人惊异，更何况它们所指的事件（被现代人）认为已经实际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亚述学家，想要从这些神谕中窥见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学之雏形：首先是占卜，然后便是历史（如果你撇开神谕中涉及肝脏的前半部分）[[7]](#footnote-7)。一些汉学家对中国的历史编撰学持有同样的观点（从占卜到历史编撰学）[[8]](#footnote-8)。

我在此保留的唯一要点是，占卜和历史编撰学这两门学科，似乎共享或栖居在（足够和平的）同一知识空间内部。当然，它们可能是，而且确实是由同一群知识分子实践的。 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来说，他是来寻求帮助的，而神谕则帮助他做出决定。对于被咨询的专家，即文士来说，记录一个"历史"神谕，转写并研究它，意味着在他的名单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神谕结构，从而增加了他关于先例的储备。

借助对著名的大年代记（Annales maximi）的研究，我们可以将这一考察扩展到古罗马，因为它已经消失了，所以更为著名。 每年，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都要写一份 "纪事"（tabula），挂在自家门前。 西塞罗将这种记录解释为罗马历史编撰学的开端，尽管它是笨拙且未经精炼的。 在对这一棘手问题的重新审视中，有人提出，这份在每年年底提交的文件，一定是作为一种关于城市与神灵之间关系状况的报告而发挥其功能的[[9]](#footnote-9)。

它被交给了大祭司，让他以 "在他的纪事上保留事件的记忆 "的身份来编纂它。他扮演了一个时间掌控者的角色。什么事件？ 什么可以被称为事件？胜利、失败、灾难、预兆：它们被收集和登记，并非为了它们本身，而是作为被允许保持虔诚的记录之标志。 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预兆：首先，人们必须决定某件事（奇怪的、特别的）是否是预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什么将是合适的答案（如何"赎偿"它）。为了完成这项工作，祭司也需要档案，并要寻求先例。

这份汇编，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罗马的"官方"历史或"宗教"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时间性，是一种市政或政治性的工作。这份报告每年都要为新任执政官撰写，涉及以下问题：我们在诸神面前的处境如何？我们做了必要的事情吗？我们应该怎么做？ 正如我所言，祭司是一个借助研究先例（特别是关于预兆）来指引档案的人，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当下。 每年他都会向新任执政官，提供一份关于城市宗教情况的报告。

希腊城市的初始选择，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占卜当然存在，神谕集也确实存在。但是，希腊人的历史编撰学，以及后来成为现代人的"历史学"，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种历史编撰学以史诗为前提。希罗多德原本希望与荷马匹敌，不过他最终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希罗多德。

作为生成矩阵的史诗

在希腊，一切自史诗始。有了它，通过它，亚该亚人与特洛伊人对峙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成为了位于历史边缘的"轴心"事件。起初，它只是一个希腊事件，然后成为了一个罗马事件，最后成为了一个西方事件。时至今日，特洛伊战争仍备受争议，甚至被否认，但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一个共同的指向点[[10]](#footnote-10)。修昔底德认为这是希腊人"共同"进行的，第一个任何规模意义上的事业。事实上，这也是他们被称之为"希腊人"的原因。回过头来看，希波战争（公元前5年）将特洛伊人变成了野蛮人（荷马的一个未知称谓），亚该亚人的远征是对亚洲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五个世纪后，维吉尔将为罗马人，在特洛伊的灰烬和埃涅阿斯的流亡中重新发现了他们历史的起点。19世纪后，黑格尔仍将颂扬特洛伊战争，认为这是欧洲对他所谓的 "亚洲原则 "的胜利。

奥德修斯的旅程而今已接近尾声。他的同伴们都已死去，他在费阿刻斯人（Phaeacians）的宫廷里被当成了贵宾。在他们的国王举行的宴会上，奥德修斯要求吟游诗人德莫多克斯（Demodocus）吟诵著名的 "木马 "情节[[11]](#footnote-11)。在这个场景中，英雄被放置在吟游诗人面前，而吟游诗人唱着（英雄）自己的冒险，汉娜·阿伦特看到了历史这一类别的开始，至少从诗意的意义而言。 她写道："曾经纯粹的事件，如今变成了历史"[[12]](#footnote-12)。事实上，我们见证了对这一事件的第一次讲述（这构成了这一事件）：初次创造历史。并伴随如下特点：奥德修斯的出现，证明了"它"真的发生了。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构成，甚至是一种反常现象，因为在史诗中，吟游诗人的话语真实性，完全只取决于缪斯的权威——既是灵感来源又是保证人。更进一步说，汉娜·阿伦特认为这一幕是历史和诗歌的典范，因为 "与现实的和解、宣泄（净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悲剧的本质，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则是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借助回忆之泪来实现的[[13]](#footnote-13)"。

"缪斯啊，请告诉我，那个有着诸多手法之人······"这是史诗的开篇之作。缪斯，记忆之女，灵感之源，是诗人之歌的保证人。随着第一部历史的诞生，口头世界的王国已经结束。散文取代了诗歌；书写占据了主导地位；缪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叙事经济（narrative economy ）的出现。 "哈利卡纳修斯（Halicarnassian）的希罗多德，通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历史的阐述..." 在不为任何特定权力服务的情况下，他的第一句话就开始定义和宣称叙事形式，而这种叙事形式，则是从他使用自己的名字开始的。他是他叙述（罗格斯（logos））的作者，正是这种叙述确立了他的权威。矛盾之处在于，与此同时，这个新的已宣称的权威还没有被完全构建起来。这种叙事策略，是希腊思想史上这一刻的特征，它标记着与东方历史编撰学家的决裂。如果说希腊人是什么的发明者，他们发明的是历史学家而非历史。这种自我肯定和写作的模式远非一种纯粹的历史编撰学现象。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个思想史时期（公元前6-5世纪）的记号，甚至是注写，这一时期见证了艺术家、哲学家、医生中的"自我主义"的崛起[[14]](#footnote-14)。

这种新的话语形式和这一独特的图景，并非诞自真空。希罗多德于希波战争，正是采取了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写法。写历史意味着从冲突开始，通过固定的 "起源 "来讲述一场伟大战争的故事。《圣经》讲述了一个肇始自世间之处的连续故事，与之相反，第一批希腊历史学家确定了一个出发点，并将自己限制在对一组特定的事件之叙述上[[15]](#footnote-15)。

像吟游诗人一样，历史学家处理记忆、遗忘和死亡问题。古代的吟游诗人是荣耀（kleos）的掌控者，是对在战争中光荣牺牲的英雄的不朽颂词的传播者。希罗多德只想确保人们事迹的痕迹，确保他们产生的纪念物不会消失，不会停止被叙述和颂扬。如果历史学家不断提及史诗，他就会给出比吟游诗人更谦虚的主张[[16]](#footnote-16)。他仿佛知道，古时关于不朽的承诺永远不可能再被说出，除非是作为一种否定：作为一种延迟忘却的承诺。同样地，吟游诗人的专业领域，涵盖了"英雄和诸神的事迹"，而历史学家则将自己限制于 "人的事迹 "上，而这一（历史学家的）时代本身就被定义为"人的时代"。他增加了关乎选择的原则：选择那些伟大的、能诱发人们惊异的事物。因此，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衡量事件差异和规整世界多样性的手段。

标志性的词汇询查（historia），逐渐占据了上风（尽管修昔底德本人尽可能从不使用它）。这是一个抽象的词，由动词historein（询问）构成。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就是去询问，也就是自己去看。它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思想状态和方法，而非一个具体的领域。这是一个属于希腊思想史上的那个时刻的词。询查（Historia）源于见证者（histôr），它与idein（看）和oida（我知道）有关。因此，见证者在史诗中多次出现，但并非作为一个目击者，只是作为一个仲裁者，或者更好的表达是，在分歧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担保人：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证任何（对他）利害攸关。

希罗多德既不是吟游诗人，甚至也不是见证者：他询查，他调查。他不具备见证者的自然权威，也没有从吟游诗人的神圣视野中获益。他唯有去询查，一种特定的调查形式，这是他历史学实践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替代物，询查的运作方式，类似于缪斯的全知视角，她知晓一切，因为她的神性使她 "无处不在"。而历史学家，除了他自己以外别无权威，从现在开始，他打算"继续他的描述，对小城和大城都要去讲述。因为许多曾经伟大的国家，如今已经变得很小了[[17]](#footnote-17)。

如果询问（如此定义）既唤起吟游诗人的智慧，又与之决裂的话，希罗多德还呼吁第二种知识（我们已经谈论过），即占卜性的知识。希罗多德是 在"探查"（historei），但他也是在"意显"（sêmainei）。他调查，他展示，他揭示，他表示。意显（Sêmainein）一词，用于指某人看到了别人没有或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并作出报告，而其动词专门指的就是神谕知识[[18]](#footnote-18)。自史诗以来，知悉当下、未来和过去的预言家被描绘成一个有知识的人。克里特岛的埃皮门尼德（Epimenides）是一位著名的占卜师，据说他的占卜技巧不是应用在应该发生的事情上，而是应用在已然发生但依旧模糊不清的事情上。占卜，在这里也是一门关乎过去的科学。这让我们还想起了赫拉克利所言的惯例（formula），根据他的惯例，神谕既不说话也不隐藏，而是"意显（意味（means））"（sêmainei）[[19]](#footnote-19)。

在序言中，正是在希罗多德第一次说到"我"的时候，他 "意显（预示（signifies））"（sêmainei）了。他根据自己的个人知识，揭示并指定了谁是第一个对希腊人采取进攻行动的人，即吕底亚（Lydia）的国王克罗伊索斯（Croesus）。作为第一个征服希腊人的人，克罗伊索斯被指定为 "对此负责"，或 "有罪"（aitios）。 借助这种调查和指定，希罗多德本人当然不是一名预言家，但他为自己攫取了这类神谕的权威。因此，尽管与我们之前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见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占卜和历史，与希罗多德依旧是有共同之处的。

询问（historein）和意显（sêmainein）这两个动词，是相互交叉的，古代和当代的知识，在这里汇合并缠绕在一起，希罗多德本人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是两种智识工具，通过它们可以"看得清晰"，并能更进一步，超越可见的空间或时间；它们描绘并塑造了第一位历史学家的智力风格。他既不是吟游诗人也不是占卜师，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希罗多德最终成为了希罗多德：历史之父。在他之后，一系列的选择被做出，并最终导致了一个新时代的形成，即现代，以及一个新的历史概念：历史（History），大写的H，历史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过程，而直到最近，这仍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信仰。

1. 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希罗多德的镜子，历史书写中的他人表现）*t*ranslated by J. Lloy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Evidence de l’histoire, Ce que voient les historiens, Paris, 2005, p. 21-42. [↑](#footnote-ref-1)
2.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早期先进文明中的文化记忆、书写、记忆和政治认同）, Munich, 1997, p. 169-174. [↑](#footnote-ref-2)
3. Jean-Jacques Glassner, *Chroniques mésopotamiennes*（美索不达米亚编年史）, Paris, 1993. [↑](#footnote-ref-3)
4. Yosef H. Yerushalmi,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footnote-ref-4)
5. Rémi Brague, *Aristote et la question du monde*,（亚里士多德与世界的问题） Paris, 1988, p. 28; J. Strauss Clay, *The Wrath of Athena*, Gods and Men in the *Odyssey*（雅典娜之怒，《奥德赛》中的神与人）, Princeton, 1983 p. 12, 13. [↑](#footnote-ref-5)
6. Jean Bottero, “Symptômes, signes, écriture”（症候、迹象、书写） in J.-P. Vernant éd., *Divination et Rationalité*（占卜与理性）（, Paris, 1974, p. 70-86. [↑](#footnote-ref-6)
7. Jean-Jacques Glassner, *op. cit*. p. 26-28. [↑](#footnote-ref-7)
8. Léon Vandermeersch, “L’imaginaire divinatoire dans l’histoire en Chine”（中国历史中的占卜想象）, in M. Detienne ed., *Transcrire les mythologies*（转写神话）, Paris, 1994, p. 103-113. [↑](#footnote-ref-8)
9. John Scheid, “Le temps de la cité et l’histoire des prêtres”（城市的时间与祭司的历史）与, in *Transcrire les mythologies*, Paris, 1994, p. 149-158. [↑](#footnote-ref-9)
10. See, for example, Moses I.Finley, “Lost: the Trojan War”（失落：特洛伊战争）, *Aspects of Antiquity*（古老的各个方面）, Penguin Books, 1972, p. 31-42. [↑](#footnote-ref-10)
11. Homer, *Odyssey*（奥德赛）*,* 8, 487-520. [↑](#footnote-ref-11)
12.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4, p. 45. [↑](#footnote-ref-12)
13. 同上，Arendt, Ibid., p. 45. [↑](#footnote-ref-13)
14. Geoffrey Lloyd, *The Revolution of Wisdom*（智慧的革命）*,*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footnote-ref-14)
15.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现代历史学的古典基础）, Berkeley, 1990, p. 18 sq. [↑](#footnote-ref-15)
16. Herodotus, *Histories*（历史）*,*I, 1. [↑](#footnote-ref-16)
17. Herodotus, *Histories,*1, 5. [↑](#footnote-ref-17)
18. Marcel Detienne, *Apollon le couteau à la main*（持刀的阿波罗）, Paris, 1998, p. 138 sq. [↑](#footnote-ref-18)
19. Heraclitus, fragments（片段） 93. [↑](#footnote-ref-19)